



# 改革应该以什么为导向

有一种“改革没有共识”的担忧。我倒是觉得,改革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必须改”。尤其是当前,民间自是强烈呼吁改革,官方也很少有不谈改革的时候。即便既得利益者,也不好意思公开反对改革的。

如果说“改革共识”是指“怎么改”的共识,我觉得这就有点难说了。相信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一种官方和民间、利益群体和普通民众皆大欢喜的改革方案。不是说改革就是调整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方式么?利益和权力这两样东西,拥有的和没有的,合法拥有的和非法拥有的,态度不会一样。所以“怎么改”的共识不容易有。

回想“文革”结束时,中国是最有“改革共识”的。当时官兵双方都觉得“必须改”,再不改,老百姓没饭吃。

到今天,中国又堆积了新的“改革共识”:社会矛盾“倒逼”得紧,底层感到被剥夺,利益阶层也感到不安全。各界都认识到,矛盾的深入就是危机。多少有点令人惊异的是,连官方都同意,目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阶层”。今天的改革和 30 年前的区别还在于:30 年前的改革,到处都可以作为“起点”,哪里开始都可以释放出能量;今天,当然,也是很多地方都需要改,但是,哪里都“不方便”先改。30 年前,不知道改革的目的地,“摸石

回回回回

跳拜违背人性,其目的是通过仪式化的举动,贬低跳拜者的人格。对君主来说,三跪九叩的大礼就是要让臣民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低到尘埃里去的”,以此显示自己的权威。

在鸦片战争前,清朝君臣自认为是天朝上国,所有国家都是来朝贡的,所以外国使臣觐见时必须三跪九叩,否则不予接见。西方国家对此要求普遍反感,但为了经济利益,有些国家可以变通接受。

英国派出的两次使团及发生的礼仪之争耐人寻味。

一是 1793 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中英双方就觐见时的跪拜礼节多次交涉。使团于 8 月 11 日到天津,清廷官员在陪同前往北京途中就提出必须跪拜,英方当即拒绝;到通州后,再次提出,英方以不熟悉礼节推托,清廷官员当即示范,但英方拒绝学习。到城里后,清廷又派传教士去游说使团,英方拿出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说如果他们按清廷要求行礼,清方也需派同级别官员先跪拜英国国王、王后像;之后,英国使团到承德热河行宫拜见乾隆,和坤多次派人交涉跪拜礼节问题,英方坚持不跪拜,只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乾隆知道后,“朕心深为不愜”,取消觐见活动,并下旨斥责英使“妄自尊矜”。

最后,双方算是见上面了,但英使到底三跪九叩了没有却是个疑问,中文文献说是跪拜了,英方材料说没有。

1816 年英国再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清廷派出多位大臣试图说服英使遵行三跪九叩之礼,但被拒绝;嘉庆皇帝闻知大怒,拒绝召见,还说“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阿美士德使团只能无功而返。

鸦片战争后,清帝自知做不到让人下跪,又不能失去面子,于是采取避而不见的策略。这样一直拖到同治皇帝亲政,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觐见,而呈国书,清廷被迫同意。同治接见各国公使,日本大使赐岛种臣行三揖之礼,英、法、美、俄、荷等国公使行五鞠躬之礼。

这次接见,被安排在紫光阁。当时各国公使均不知清廷如此安排的“险恶”用心。紫光阁不在紫禁城内,而是在西苑,一般用于接见外藩属国贡使和蒙、藏王公。这意味着清廷仍将各国公使当作藩国贡使要耍一番。

现在来看,清廷的固守不让多属不必要,实质是对皇权尊严的竭力维护,而非真正出于国家利益。这也反映了儒家倡导的礼制,在历史实践演化为皇权专制的维护者,成为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负面因素之一。

(摘自《新京报》5.26 洪振快/文)

回 我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一年,发现人们打招呼问好,并不局限于熟人或者朋友之间。尤其在教堂、酒吧或者其他社交场合,人们会十分自然地向陌生人问好,有时还会聊得十分投机。时间一长,我也颇受这种习俗的感染。

一天,朋友忽然问我:你在国内也能这样吗?我一时无以回答。一般来说,我们对陌生人都不会微笑。在两种情况下,微笑尤其容易引起尴尬:其一,对陌生领导微笑比较危险,通常情况下,你越微笑领导就会越严肃。到后来,你会发现自己不像是微笑,而是讪笑。其二,对陌生异性最好不要微笑,人家十有八九会认为你居心不良。即便对于一般的陌生人,在许多情况下,没有由头的微笑往往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警惕:这家伙想干吗?

中国原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一般来说,人们只信任熟人,也只得温情和关爱留给熟人。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什么事情,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托关系、找熟人”。而且,这一条路也的确最为可靠,只要是熟人介绍的事情,大家一般都会尽心尽力地努力办好。

人们对于“关系”的恶评,一般源于两个方面:从大的方面来看,担心“关系”有损社会正义;从小的方面来看,发现处理好各种“关系”往往很难,因此为之苦恼。其实,社会正义不彰,根本原因不在“关系”本身,而在于社会公义乏力,或者“关系”被滥用。例如,如果社会真正实现了“法治”,则人们可以轻松地通过正路办好事情,那么,人们也就会对少对关系的依赖。如果正路好走,人们又何必自寻烦恼?在社会正义不彰之时,人们有时恰恰是依赖关系求得基本的社会正义的。

要确保陌生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其中的底线,则在于确保一方不能利用另一方的信任伤害到另一方。在西方社会,人们通过严厉的法治,基本能够做到这一点。例如在商业领域,陌生人之间可以放心地做生意,而不用担心受到另一方的欺诈——这种信任,表面上是对陌生人的信任,而根本则在于对“法治”的信心。由此可见,陌生人伦理的建立,绝不可能存在于熟人社会的“关系伦理”之内,而只能存在于“社会公义”之中。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许多耸人听闻的社会悲剧,例如毒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小悦悦事件,等等,其实都是“陌生人伦理”的缺失所致,归根到底,则是社会公义不彰的缘故。

至于小悦悦事件,则要数凤凰卫视的梁文道的评论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在他看来,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虽然备感痛心,但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基本属实——在社会公义不彰,“陌生人伦理”尚未确立完善之前,小悦悦的悲剧既非第一例,也绝非最后一例。(摘自《学习时报》5.28 黎志敏/文)

回回回回

这几天有个网络事件可谓一波三折、波澜起伏。一个患了严重白血病的小姑娘本来自己默默在微博上写生命中的最后感悟,结果被人转发。绝大多数人都是诚挚祝福这个女孩儿,但也有人出来说这是一个炒作,根本没有这个人、也没有这个事。然后就是情势 180 度逆转,各种谩骂铺天盖地。而坚信此事为真的网友通过调查发现,此事并非网络炒作,而是确有其事。

网络效应能够急剧放大人间的善恶,尤其在我们目前诚信缺失、炒作盛行的环境下,对于一个看上去正常的表达生命美好与坚韧的故事不能信任,大概也算是我们这个不算正常社会的常情。质疑是一个人的正常权利,如果没有这个权利,社会也很难进步,但质疑有几个原则要遵守。首先是有理。这个“理”我个人理解为正常的道理,比如说针对个人进行质疑的时候,无论是不是名人都要保持最大的善意,而对于个人的私域且不涉及关乎大众利益的部分,不可随便质疑。其次是有力。质疑需要绝对有力的证据,而不能拿出随便什么渠道的消息就当做“铁证”,而一个“铁证”破产之后,对于自己已经辟了一地的节操以破瓷不顾的勇气,接着四蹄蹬开、翻蹄亮掌地奔赴下一个“铁证”,这就不叫有力的质疑,而是耍赖。最后一个原则是节制。质疑只有针对掌握公共权力者才能不断进行,直到水落石出。但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无间断地质疑而又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结果,除了让质疑者成为小丑之外,怕是没有其他任何效果。这样的质疑只能毒化社会环境,进而提高社会互信成本。网友说“质疑泛滥,使社会再次断裂”就是这个意思。当无善意、无理由、无休止的质疑针对一个个体的时候,无论这个个体是什么人,最后都会走到这个结果上。

另外,我倒是更想聊聊质疑的成本。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质疑政府或公职人员一般是没有什么成本的,最多付出一些研究的时间,而质疑一个个体则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他必须为自己一旦过分超过边界的质疑埋单,承担某些后果。但咱们这里正好相反,如果你质疑政府或者某些公职人员的作为,前有跨省之类的教训、后有“被精神病”的经验,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很多人置温总理所说“创造条件让人们批评政府”的话于脑后,致力于打击不同意见的大业。但同时,对于应该保护的个人权利进行无限度、无根据、无底线的攻击,则几乎很难让那些拉下一张脸满地打滚的人付出任何实际的代价。这种颠倒的状态,怕也应该算是现代社会的奇观了。

毁掉一个人有多难?对某些没有底线的人而言,这事儿,不难。(摘自《南方都市报》5.24 五岳散人/文)

## 给陌生人一个微笑



# 1958 年:村村有李白 人人会写诗



1958 年,中国掀起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在“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的突击式群众性文艺创作运动中,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样,文艺战线也捷报频传,“卫星”频发。

重点任务: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十五年后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柯的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柯文的启发之下,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

1958 年 8 月以后,文化部、中宣部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

那年

## 黄帅新生录取通知书背后

1979 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应届毕业生黄帅接到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理工科考生黄帅的成绩总分为 322.5 分,符合北京市规定的录取分数标准。体格检查也符合录取条件。但是由于“四人帮”1973 年曾利用当年年仅 12 岁的她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教育战线制造混乱,这次是否录取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不应该录取她,理由是:《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教育战线造成的危害很大,她错误严重。另一些同志认为,应该录取她,理由是:“四人帮”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既破坏了教育,又坑害了学生,黄帅也是受害者。

面对黄帅的问题,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 320 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1979 年 9 月 5 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1984 年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1988 年赴日留学,1993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获硕士学位,1998 年回国,供职于母校北京工业大学。(摘自《高考年轮·高考恢复 30 年》马国川、赵超构/著)

在上世纪 50、60 年代,甚至在 80 年代前期,杨朔(1913—1968 年,山东蓬莱人,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曾风靡大江南北。

解放战争时期,杨朔担任新华社战地记者,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955 年到中国作协工作,1958 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会”)主要领导人。杨朔在“和大会”期间曾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文革”开始后,“和大会”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第一步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军代表给每人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审查”,被隔离审查的大约有六七个人,杨朔也在其中。

据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当时给杨朔定的罪名是“丁(丁玲)陈(陈金匱)反党集团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

那事

进”。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很多地方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 60 个剧本”……不少著名文艺家个人也制定了“跃进”指标,例如,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 and 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

放卫星:“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全民大办文艺的结果是短时间内涌现出许多的农民、工人作家、诗人,上海自称拥有 70 万人的文艺大军,成立了 200 个工人业余创作小组和 1000 个农民创作组。

清华作为一所理工为主的高等学校,此时成了著名的群众文艺创作的典型。全校 1 万名学生,创作了 5000 多首诗,3000 余首歌曲,1500 个剧本,2000 篇小说、散文、特写、曲艺,3000 多幅漫画,办了 700 多种系和班级的油印刊物。

1958 年文艺界所放“卫星”中,以当时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和“新壁画运动”最为引人注目。一时间,全国到处是“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1958 年 3 月 22 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看着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开展得如火如荼。“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龙王辞职》:自古水住低处流,谁

那剧

## 琐忆

◎1944 年 8 月 8 日,方先觉在衡阳苦撑 47 天,突围、自裁均失败后,为数千伤兵计,举旗投降(抗战中唯一投降的黄埔系将领)。几个月后,方先觉在军统衡阳站的接应下回归。1945 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喊杀方先觉之声不绝于耳。退到台湾后,方也是无处可躲,无地可避难。1968 年退役后,方先觉抱着蒋校长的膝盖痛哭,为蒋校长一声叹息中落发为僧。

◎1945 年 4 月,西南联大学生准备纪念“五四活动”,国民党云南党部赶忙让昆明三家电影院赠送 5 月 3 日、4 日 2800 张电影票给学生,以干扰破坏集会。地下党立即贴出“大字报”,称:免费票是国民党省党部用公款买的。于是有学生当场撕票,工学院学生还用数学公式加以说明:“电影票=一只猪肉=大学生的灵魂!”吴晗则总结说,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对捕捉他的人说:“别杀我,我会给你一个王国。”在中国却是:“别开会,我会给你一张电影票。”

◎1918 年 5 月 20 日,江苏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文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然后再折回前门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

散叶

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但这并没有

什么具体的“罪证”。据杨朔的同事,著名历史学家资中筠回忆,杨朔并没有特殊历史问题,中央文革也没有点名批判他的某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杨朔是领导,又是作家,在那种特殊历史环境中必然会揪出来。

资中筠记得,1968 年 7 月底,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

“杨朔比较迂,他太老实,太相信党,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资中筠说。(摘自《看历史》第 2 期 李杨/文)

忆

见河水翻山头;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挥江河有自由。”“龙王一见愁上愁,告老还乡去退休;调动一切积极性,还是把他社里留。”《月宫装上电话机》诗:“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普通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 1958 年“新壁画运动”中,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马,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中共河北昌黎县委宣传部长黄德玉在发言中说:“该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在 3 月 18 日开始,7 天突击,3 天扫尾,到 3 月 30 日共计 12 天的时间,就把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 6 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

短暂热闹后偃旗息鼓

由于文艺“大跃进”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文艺家、诗人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了。1959 年 3 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办?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再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和随后到来的全国严重的粮食饥荒,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的锐减,文艺“大跃进”逐渐偃旗息鼓。(综合《文史精华》徐枚梅 吴继金/文、《1958-1962 年的中国知识界》罗平汉/著)

## 《血战台儿庄》让蒋经国同意老兵回大陆探亲

1988 年 6 月 11 日,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万民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令尊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血战台儿庄》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这是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就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复制了一盘录像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谢忠侯马上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像带飞回台北。台湾方面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地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

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不久后,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 37 年后,终于把苦苦的愁怨化做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摘自《人民政协报》顾育豹/文)

那剧

## 《血战台儿庄》让蒋经国同意老兵回大陆探亲

